

---

## 主持人语

自3月美国白宫公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任内首个外交政策演讲以来，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受到广泛关注。与特朗普政府“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不同，拜登上台可能意味着理想主义外交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作为两种“对立”的外交思想和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从美国立国之日起便贯穿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实践中，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外交风格。此次工作坊主要围绕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涵义、根源、相互关系、历史上的表现及其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能影响进行讨论。

与会学者认为，理想主义根植于美国的国家特性、文化传统和国内社会，因而具有持久性并会反复出现。虽然其他国家在外交中也会有理想主义的要素，但一般认为历史上典型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和行为主要是由美国提出并推行的，而且美国从建国一开始，也就是在其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打出了理想主义的大旗，因此与其他国家还是有所不同。

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目标在一些情况下是决策者和政治家用来论证政策正当性的招牌和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幌子，但有些情况下却来自民间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压力，得到民意的支持，具有真诚性的一面。

与会学者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往往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相互交织、相互争夺和相互融合。在道义目标损害现实的国家利益时，理想主义会服从现实主义，这导致美国外交

---

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

应该深入理解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内在逻辑，根据这一逻辑来指出其人权和民主口号的缺陷和局限性，而非停留在简单化的谴责上。只有这样，我们的批评和谴责才有针对性，也才会打动外国听众。

王立新

2021年4月25日

---

## 博雅工作坊第 43 工作间

### 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2021 年 4 月 17 日

自 2021 年 3 月美国白宫公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任内首个外交政策演讲以来，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受到广泛关注。与特朗普政府“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不同，拜登上台可能意味着理想主义外交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作为两种“对立”的外交思想和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从美国立国之日起便贯穿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实践中，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外交风格。本期工作坊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及首都师范大学的 12 位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一主题，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含义、根源、相互关系、历史上的表现及其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能影响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对外战略困境：表现、成因及对策》。**

于铁军回顾了王缉思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对美国外交的相关论断。王缉思通过对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分析，指出美国外交思想中存在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不同时期的美国政策、思想明确分为两种类型，或者将决策者截然分成两派。两种

---

思想方式、两种判断标准的斗争无处不在，但相互之间又常常渗透包容、对立统一，实际上美国领导人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两个方面寻求某种平衡，同时找到自己的政策基础。于铁军赞同这一观点，认为从短期来看也许存在着某种矛盾，即从当时的具体情况能看出它倾向于这一面或者那一面，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两者还是统一的。

随后，于铁军总结了当下的三位现实主义学者有关美国对外战略的困境、成因及对策的看法。

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列出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三分法”。他认为，自冷战终结到 2016 年，三任总统的对外政策中出现了一系列错误甚至是灾难。例如，灾难性的大中东政策；与俄罗斯、中国的大国关系急转直下；世界并不是向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美国的这种对外政策是自由主义霸权政策，不仅未给世界带来和平，在国外的穷兵黩武反过来又破坏了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气氛。特朗普上台后带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米尔斯海默从思想史、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固有缺陷等角度出发分析了原因。自由主义者承认天赋人权和人有不同，认为个人自由重于社会契约，并主张通过“宽容”及“国家权威”来解决国内不同的价值观和权利追求。但是由于在国际范围内不存在这样的权威，所以相比于强调团体而非个人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将自由主义理念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原则推行就会是一种很差的结果。

米尔斯海默提出，美国应奉行现实主义的自我约束政策，

---

既然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在无关美国核心利益的地区问题上，就应采取收缩战略。但他同样悲观地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精英们受理想主义的影响非常深，让他们改弦易张、收缩战线很难。

沃尔特对美国对外政策困境的认知基本与米尔斯海默相同，但他将这一原因归结为美国对外政策精英的不负责任，不断重复错误却不换一种想法。对策上则强调进行离岸均衡，避免搞政权变更和国家再造，放弃自由主义霸权的执念，但沃尔特也觉得难以改变。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是欧洲现实主义，而非美国原始的。他认为美国人对民主的笃信、相信和平是世界的常态、认为每个问题都能通过民主获得解决是改变不了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美国没有任何生存威胁或国家安全上的挑战，难以改变自己的乐观想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征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经典路径到科学路径：战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主要问题》。

经典路径(classical approach)和科学路径(scientific approach)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二次论战，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的两种不同路径。两者的分歧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即应构建什么样的理论及这种理论应提供什么样的知识。根据英国国际政治学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界定，经典路径是指“源自于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的构建理论的路径，这种路径的首要特征是明确地依赖判断力的实施和一系

---

列前提假定”；与此相对，“那些采用‘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其命题要么是基于逻辑上或数学上的证据，要么是基于非常严格的经验性检验程序”。在国关领域来讲，经典路径最杰出的代表是经典现实主义，科学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二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有两个，经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到70年代沃尔兹著作面世，结构现实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现实主义理论跟政策几乎完全脱节。关键在于，沃尔兹采用新古典经济学，代表的是一种经济学向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渗透。其理论的先天弊病在于本质上是类比论证，具有无时间维度、无空间维度两大特点，跟具体政策没有关系。这里面延伸出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解释立场越来越退化。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是在体系结构中加上国家单元的认知，但是按照沃尔兹的标准来看，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进步。二战之后经典现实主义被排斥出整个现实主义阵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倾向。

吴征宇指出，经典现实主义的潜力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理论构建，二是政策研究。科学路径的理论构建由于两大问题而无法成功，第一是主客体难以分离，研究人类社会却带有自己的偏见，难以创造出所谓的科学规律。第二在于核心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与其他学科的完全割裂造成现在国际关系理论进步乏力。而经典路径则在这两方面有所弥补。政策研究上，科学路径理论的最大标准是确定性及其可控制性，

---

但是政策理论恰恰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所以关键是学会思考，而不是提供教条。经典路径的意义正是作用于人，教会你如何思考战争，而不是给你一套从事战争的操作手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牛可的发言题目是《战略谨慎与国家安全权势集团》。

牛可认为，“战略谨慎”是一种认识论态度和思想素质，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素质和美德。在美国政治史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迹象，但在研究上很难把握。“战略谨慎”是一种反向机理，是用来牵制和削弱某些东西的，是一种用于抗衡而不是用来加强、推进某些要素。它是对一些自发的、持久的、强大的趋势的一种制约。就美国而言，二战后战略谨慎就是要制约随着美国全球地位和军事实力快速上升而出现的战略过度扩张的倾向，尤其要克服美国军事主义的倾向。在财政上，“战略谨慎”还表现在始终克制因国际斗争需要而对军事投入过多资源的倾向。所以基本态势是，在冷战的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军事支出、国家安全的投入，在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当中的份额是长期下降的。与之相比，苏联军事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是美国的两到三倍或更多。

牛可试图通过分析美国权势集团的特点，以历史纵深和文化向度来理解美国的战略谨慎。在他看来，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美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紧致、边界分明、同质性相当高的对外政策精英集团，或者在而后者那后被称为国家安全精英集团。这个权势集团的主体是以华尔街为基础，大多是东部沿海和国际商业有关的律师经理人阶层。历

---

史地看，他们有 19 世纪美国新英格兰文化精英的血脉，以及 19 世纪工业化运动产生出的新商业力量，包括新的专业化社会科学的力量。这一阶层有着复杂的思想元素，包括在进步主义运动当中产生的管理主义、科学主义，温和的国家建构路线等等；同时有一定包容性的知识和文化立场。他们和下一代的政策精英，即越南战争前后崛起的那一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家相比，有一些关键特征的差异。他们有强固的美国中心论倾向和意识形态执念，但有并不是一种过度板结的、极端化的、辉格式目的论的意识形态，而是有着比较复杂的、多元化、多因素的智力构成。这种情况对于理解冷战时期他们主张的美国对外政策谨慎特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度。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的发言题目是《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传统及其根源》。**

王立新认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理想主义是指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对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进行改造的思想、政策和行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最主要阐述者，他在一战结束前后的一系列演讲中提出的理想主义外交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不认同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然状态，追求国际关系法制化和有序性。第二，反对在欧洲盛行的均势原则，倡导集体安全。第三，反对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倡导自由贸易。第四，反对专制制度和有形帝国，即欧洲主导的殖民帝国，倡导自决、（西式）民主和人权。第五，反对国际关系行为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认为公民社会中约束个人关系的伦理规范，应该运用



---

到国际关系中去，追求外交行为和国际关系道德化。

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有三大根源。第一，美国具有独特的立国原则和国家认同。美国不是建立在共同血缘、共同祖先或共同历史经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古典自由主义信仰的基础之上。这决定了美国必须要在对外关系中捍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否则该意识形态的效力、吸引力就会大大折扣，美国的国家精神就会削弱甚至消散。第二，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用建立均势就完全可以保障安全。所以从建国一直到卷入二战，美国在其外交实践中缺乏地缘政治理念和均势外交的经验，也缺乏国家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在二战后期冷战兴起之后才建立起国家安全机构。第三是美国独特的外交政策过程。美国外交决策与内政一样，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开放的民主过程完成的，国会享有很大的外交权力，这些都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奉行秘密外交。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在历史上具体表现在威尔逊的外交，以及二战后美国对德国、日本的改造。

王立新指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同时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具有双重标准和虚伪性。首先是国际政治的逻辑，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其次，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在向西拓开辟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实用主义传统，不会一以贯之严格恪守信条，而会灵活地处理对外关系。第三，现实主义者的反对。美国有强大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精英，他们强烈反对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第四，美国的国家实力。理想主义带来的不是战略审慎，是战略冲动和过度扩张。但一个国家的实力总是有限，普通老百姓并不

---

同意付出国家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改造，所以对理想主义构成了强大制约。所以，在一战、二战胜利后，美国国家实力超强之时，理想主义才盛行于美国。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理想主义传统都受到制约，因此美国的外交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理想主义的这些道德伦理目标、人权和民主的口号往往成为工具。

王立新将美国外交总结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融合，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有不同的政策方式，也发生过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够由此否认美国外交中存在理想主义传统，理想主义外交在美国有很强的民意基础，不仅仅是幌子和借口，而是会不断地出现。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周桂银的发言题目是《自由国际主义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

周桂银首先介绍了后冷战时代新自由国际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自由主义一般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其中新自由主义又包括新古典自由主义及新自由国际主义。新自由国际主义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三个重要的分支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相互依赖与贸易和平论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其中包括以约翰·伊肯伯里为代表的民主安全共同体构想，这也是对奥巴马及拜登政府产生最大影响的一分支理论，其主张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或者美欧所主导的民主安全共同体。

新自由国际主义者有一个外交政策圈，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东部权势集团的分支，最大的共识是推行自由主义霸权，

---

核心是建立和巩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其内部可分成温和派和强硬派。

温和派属于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多数派，核心立场如下：第一，持有多元主义立场；第二，强调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承认战后国际秩序；第三，有着改造世界的尝试，将主要行为体区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第四，认为内政与外交是双向而复杂的互动，因此主张推行包容性的接触、联系原则、有限的干涉、对话性的全球治理等。克林顿和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大致以此为基础，他们均欲建立一个普遍的、非排他性的世界秩序。

强硬派属于少数派，或可称为干涉派。核心主张如下：第一，持有一元主义立场，即西方普世主义；第二，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为中心，把国家区分为民主、非民主和非法的，自由国家有责任对后一类国家进行基于美欧政治与文明标准的排他性接触、遏制、甚至武力干涉；第三，强调无边界的全球治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共和民主制，建立同质性的世界秩序。

自由国际主义者影响政策实践的主要方式是借助旋转门机制。他们不只是学者，还通过智库提供政策咨询，并长期参与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里仅举三个案例。一是罗伯特·基欧汉、安妮-玛丽·斯劳特、伊肯伯里号称“普林斯顿三剑客”，他们发挥政策影响的代表性事件，是在2006年小布什政府时期提出《铸造一个法治下的民主世界：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咨询报告。二是大西洋理事会在2013年设立《建设一个团结而强大美国》研究项目，其后续报告

---

主张，要维护基于民主和价值观的美国霸权。三是当前民主党对外政策智囊聚集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智库，其代表人物安东尼·布林肯、库尔特·坎贝尔等人先后提出几份报告，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主张。

周桂银认为，温和的自由国际主义派在拜登政府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在理想方面很执着，但在具体做法上比较务实，即坚定而不会妥协。从战略视野、战略经验、战略能力上看，新政府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占有一定优势。

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路线图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在安全上组建更坚定、更聚敛的同盟；第二，在经济和科技方面注重国内建设，注重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之间的“安全的产业链”；第三，价值观外交更坚定，更有章法，但是更低调；第四，注重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的全球治理。总之，新自由国际主义带有两重性，从来都是两手准备，根据具体形势来决定“接触”和“强制”手段的程度，而不是二选一。总体趋势有可能是在美国领导下维持和巩固一个小规模、高效率的西方民主安全联盟。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玮的发言题目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美国外交实践中的折中主义》。

王玮提出，政策和理论一样，是应然逻辑和实然逻辑的混搭。在应然逻辑中，现实主义理论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均势和平论，还是沃尔兹的两极和平、多极和平，都是强调一种权力之下的和平；自由主义则是基于规则的秩序，强调制度和和平；建构主义讲究规范。在实然逻辑中则涉及不同的问题：现实政治关于谁维持秩序，自由主义关于谁来制定这个

---

规则，建构主义则关于谁的规范是管用的。

用卡赞斯坦的观点来说，这三大主义在现实状况中应该是一个“折中主义”，是多元的，而不是为了追求简约美，放弃了其他角度关注的一些问题。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中，折中主义范式有较强的适用性。。例如，讲到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时，经常能看到一些包含保留语气的前缀。例如，用“讲原则的现实主义”形容老布什和特朗普的政策；用“自由帝国主义”形容杰斐逊；甚至还有人用“更高的现实主义”来描述威尔逊的政策。就拜登政府而言，它应该会奉行一种“灵活的自由主义”。

王玮认为，美国外交传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在其形成过程中进行探讨。根据麦克杜格尔的分类，美国在十九世纪形成了国内地方主义的信条；二十世纪则形成了有关国际主义的信条，其中包括两个类型，一个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威尔逊传统，另一个则是硬核现实主义的罗斯福传统。威尔逊、罗斯福及其后总统的政策大多受这两种传统的交替影响。

最后，王玮对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比较，认为差异主要在政策议题排序和资源投入方面。拜登政策目标的排序为恢复美国经济，重新树立国际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传播美国价值，有节制地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恢复美国联盟体系的活力。而在特朗普时期，“边境控制”和“主权权益”是重要关键词，但“国际制度”和“联盟体系”并未被列入。此外，在一些共同主题上，拜登政府的优先次序较之前任也有所改变。此外，拜登对华政策还有以下新取

---

向：第一，不再只盯着中国，而是把中国、俄罗斯跟其他国家关联起来。第二，不再只搞竞争，而是称战略竞争的同时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欢迎与中国、俄罗斯进行对话合作。第三，回归美国国内问题，投资美国经济，重建美国民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帆的发言题目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美国国家情报观》。**

张帆指出，美国国务院、海军和陆军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但并无一个整体的国家情报机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要在和平时期建立一个常设的、国家级的情报机构是很困难的。从冷战初期到现在，美国情报界或国家安全界都要回答公众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美国在和平时期需要全国性的情报机构？第二，这个机构用什么手段为国家安全决策提供优质的情报？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二。首先，美国社会充满着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像情报这样现实主义的东西在美国生根非常困难。其次，美国社会有反国家主义的情绪。连联邦政府要建立的机构，美国民众都会提出质疑和反对。对于建立国家情报机构的想法，美国民众称不需要“盖世太保”。

为此，美国在倡导建立自己的国家情报机构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现实主义方面，美国面对的对手更不讲道德，美国和他们竞争、对抗就必须有自己的情报和手段。理想主义方面，美国国家情报观和国家安全战略观是一致的，即所作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推进美国的民主，都是为了战胜所谓的集权和暴权。此后，时代虽然不同但逻辑是类似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把扩散民主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目标，美国

---

国家情报机构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9·11”之后，美国民众对国家情报工作的指责不再是机构存在的必要性问题，而是人力不足的问题。在今天，大国竞争既是治理模式之争，背后更是意识形态之争。面对中国、俄罗斯情报方面的更强大，美国认为情报机构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且其目标充满着现实主义色彩。

在使用何种手段获取情报的问题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更尖锐，因为国家安全本质强调隐秘、效率，不强调手段的正当性。美国最早建立情报系统时就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分歧和争论，并依靠法律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国家安全法》或《中央情报局法》，不仅规定要成立情报机构，还界定了一系列情报活动和情报概念。美国每届政府都有法律顾问来解释执行每一项任务是否合法，并通过这个办法再次赢得了民众，赢得了国会的支持。另外，美国还通过技术手段试图规避情报收集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空中情报突破苏联的陆上封锁，达到可以不和人接触即获得情报的水平。然而，技术的使用是否会突破法律的界限也是一个问题。

具体实践中，美国受到的约束比其他国家要多，始终要在道德和手段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张帆认为，美国情报界有一种理想主义的问责制，讲求法制，国会对情报系统进行监督。“9·11”之后美国情报界走向更加公开透明，情报官员更多地出现在媒体上并回答公众的问题。上述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情报理念和情报实践特征，都可以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角度进行部分解释。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翟韬的发言题目是《美国对外宣传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翟韬认为，美国的对外宣传既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现实主义的一面体现在它是一种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工具，是最简单的心理战。例如在朝鲜战场上撒传单造谣攻心。理想主义的一面则体现在它是一种改造对方或改造它所感兴趣国家的文化手段，如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中国的“文化实验”及福布莱特项目；或是一种国家身份的文化表达方式，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宣传丰裕的美国梦及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它不再宣传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而是宣传美国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一方面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用美国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吸引对方，更重要的是说给自己听，用经济上的优越和物质丰裕定义自己，用外宣投射国家身份。

翟韬指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可能在同一个宣传主题中共存。以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解放政策为例，匈牙利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解放电台鼓动苏联和东欧人民“起义”，推翻共产党政权，这一行为实际包含着四层含义，既有理想主义也有现实主义。首先，解放战略是一种冷战工具。其次，解放战略也是政策本身，因为冷战期间核威慑双方打不了热战，只能进行心理战层面的威慑，美国的宣传和心理战等同于冷战本身。第三，理想主义的层面，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宣传，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对俄罗斯文化改造冲动的一种延续。第四，所谓对苏联的解放宣传，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国家身份的文化表达，通



---

过“东方主义式”地攻击苏联政府和苏联政治的弱点，即“你是专制我是民主；你是集权我是自由体制”，来不自觉地表达自己的国家身份。

翟韬认为，美国当今外宣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第一，特朗普和威尔逊有相似之处。特朗普对华宣传攻击和实际制裁是区分政府和人民的，认为人民是好的，政府是不好的，其制裁以“取消中共领导地位”为目标。这和100年之前威尔逊的想法很像，威尔逊区分人民和政府，人民都是好的人民，只有专制政府不是好的政府。第二，副总统彭斯和艾奇逊也存在相同之处。彭斯2018年5月发表演说攻击中国共产党“忘恩负义”，宣传中美友谊，与1948年艾奇逊对华白皮书用词、段落一模一样，举的例子也一样，其核心论调都是美中人民是有传统友谊的，中共是“忘恩负义”的，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并不是说特朗普和彭斯一定就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存在某种善意，而很可能是外交话语和外交思路上的依赖。这是美国外交传统的理想主义或者威尔逊式国际主义外交思路的一种传承，不自觉地按照那个思路思考问题。

翟韬总结称，美国外宣中文化改造或文化表达的理想主义，与作为服务军事外交工具的现实主义一样重要，很难分清美国真实的外宣意图或政策意图。因此必须对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特殊历史情境有深刻了解和重视，才能理解美国对外宣传的内容和真实动机，才不会误读。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谢韬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美国外交的例外与非例外》。

---

谢韬认为，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价值观、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这三大关键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外交价值观中理想主义显示度非常高，然而国内的选举政治及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这两个现实主义因素实际上对美国的理想主义有一个很大的限定作用。纵观历史，美国很多时候是以例外之名，行非例外之举。例如，彼得·图波维兹在《政治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美国国家战略可以用两个变量进行解释，一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大小，二是执政联盟的政策倾向。他的理论不包括美国的价值观，却基本解释了美国历史上 12 位总统的国家战略。又如，米德在《特殊天命：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了世界》一书中指出，美国有四大外交传统，但在谢韬看来，只有威尔逊主义能代表美国理想主义的传统，另外三个传统则更多地体现了非例外性：汉密尔顿主义崇尚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杰克逊主义宣扬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杰弗逊主义则是典型的重农主义，强调弱政府。

谢韬指出，每个国家都有“例外”的迷思，只不过美国依靠其特殊的建国背景、世界第一的综合实力、独一无二的外宣网络、以及无以比拟的话语建构能力，使其理想主义在世界上能够被传播和引发共鸣，但美国外交中真正有多少理想主义成分，实际上很难定论，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收集数据进行经验性的验证。“例外”明显具有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把美国置于道义的制高点，更有优越感，甚至因此让人产生反感，但并不能就此否认美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巨大贡献。现在否定美国“例外论”的时候，往往把美国本身也

---

否定了。在中美战略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今天，学者也应该客观认识美国的例外和非例外。

最后，谢韬总结了影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五大关键性因素。第一，国内政治环境，美国政客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选举和执政联盟的需求。第二，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现在美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较差，包括中国崛起、中东乱局、俄罗斯威胁，美国正在往战略收缩的方向走。第三，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遗产。第四，美国的价值观，即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第五，中国的国际国内行为以及对美政策。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邢悦的发言题目是《美国对外政策特殊在哪里？》。

邢悦首先区分了“外交（diplomacy）”和“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两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行动和过程，外交对应武力或者武力威慑。“对外政策”是指一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事务的战略方针，包括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而外交和武力都是对外政策实施的手段，因此外交是包含在对外政策当中的。

邢悦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都包含道义和利益两个方面，世界大国尤其不可缺少道义。因为国家利益包括生存、自由、发展和尊严，国家获得尊严的方式就是要讲道义。小国的尊严是通过遵纪守法获得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而大国的尊严则是通过在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建立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来获得感召力和领导力。

邢悦用三个问题来回答美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第一个

---

问题是，美国多大程度上追求道义？她认为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最重视道义的国家。首先，美国认为它和其他国家主要的区别即在于其道义的力量，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不是用军事力量消灭敌人，而是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敌人。其次，在国家利益中，国家尊严与生存、安全是有冲突和矛盾的，生存和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当国家面临生存和安全利益威胁时，不得不放弃道义追求。而由于美国自登上世界舞台就有强大的实力，它基本上没有生存和安全之忧，所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道义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第三，美国经济实力雄厚，一般不会将经济利益置于道义之上，除非道义追求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没有一项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不过，美国常常把经济利益和道义结合在一起，使对外政策既能够维护道义又能够促进经济利益。最后，美国对外政策受到民意的限制，缺失道义目标的对外政策是很难被民众认可和接受的。正因如此，美国历史上以现实主义外交著称的政治家很少受到美国民众的尊重和赞誉，因为美国民众认为，他们会使美国沦落到了和其他国家毫无二致的地步。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追求什么样的道义？王立新老师的报告已经详细阐述了，美国的道义就是美国的理想主义，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制度、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集体安全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反对独裁专制，反对政府垄断经济，反对激进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如何实现它的道义？对内，美国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强调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一定要有道义力

---

量，同时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外，采取实用主义哲学，为了实现其目的美国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伦理学是以行为动机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正义的标准，同时特别注重实践和结果。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表现为美国非常注重观念和手段的有效性、可行性。一项对外政策有了道义的目标才有合法性，但是一旦它在实施过程中超出了美国能力或与美国现实利益背离太远，它就被认为是错误的，不具有合法性了，这样就防止了道义目标的对外政策对美国现实利益的损害。

邢悦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在于其目标的道义性和手段、评估方式的实用性的结合，正如基辛格所说，“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国家，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义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的发言题目是《为什么美国外交总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物？》**

张小明认为，美国外交一直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的混合物。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主要是由理论家界定的，从事美国外交实际工作的人一般不会持如此二分法。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国家，或许是世界上主要大国中理想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国家。这美国的立国源于最早由清教徒在北美开拓的殖民地有关，宗教色彩一直非常浓厚，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色彩自然也很浓厚。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崇尚权力和追求自身利益、现实主义色彩很浓厚的国家。从根本上说，至少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的本质被认为是权力政治或实力政治，这是近代以来

---

欧洲国际政治的主题或者基本逻辑，后来扩展到全世界。美国作为欧洲的衍生物，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是美国对欧洲传统的自然传承。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欧洲外交是一致的。

因此美国外交中总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物。这是否美国外交所特有的呢？张小明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外交最大特色在于，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既有对于对外政策正义性的高度自信（理想主义），同时有对自身实力（特别是物质实力）的自豪感（现实主义），两者的结合使得美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超级大国，并具有极大的塑造能力，当然也有很大的毁灭能力。有理想、不现实，外交走不动；无理想、很现实，外交走不远。

为了更细致地分析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如何混合的，张小明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哪种成分更多一些？两种成分的多寡难以进行测量和科学分析，因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总统各有侧重。一般来说，共和党总统现实主义色彩更浓一些，民主党总统理想主义色彩更多一点，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理想主义的语言表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外交的真实动机？美国政治家在表述美国外交时倾向于使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比如有关自由、民主与专制、暴政之间斗争的话语，从“杜鲁门主义”演说一直到今天拜登总统的对外政策宣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话语是动机和工具二者兼而有之，很难加以清楚区分。

第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否完全对立？两者不一定

---

对立，而是可以重合、共存。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道义很难截然分开。比如，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而安全和繁荣包括意识形态和道义目标，即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稳定、生活方式不受侵害、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等等。

第四，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是否只是美国外交的特色？这可能不是美国独有的，而是所有国家共有的特点。这或许和人性的两面性有关。人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本能地追求自我生存和个体利益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追求道义和理性的目标。由人所组成的国家之行为动机也有类似的两面性，所有国家的外交一般都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物，只不过美国外交中的两者结合可能比较典型。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刘德斌的发言题目是《历史的回归与理想的终结：美国外交的新现实》。**

他指出，在中国学界热烈讨论“百年变局”这一命题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学界相关的讨论也在进行之中，只是没有中国学界那么“乐观”，也没有采用“百年变局”这样的概念。概括起来，美国和西方学界的讨论从 1989 年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到 2008 年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这样的轮回。2008 年之后，这方面的讨论更深入了。中国学界看到的是“东升西降”，看到的是中国等一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而美国和西方学界则看到的是“野蛮的回归”“冷战的回归”“大逃亡的回归”和“丛林世界的回归”等等。对于“历史的回归”这样一种论点，中国学界应予足够重视，因为这一论点已经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影

---

响。中美关系的“逆转”，美国共和党 and 民主党在对华“强硬”外交上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关于世界局势，刘德斌从世界历史结构变化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西方的终结，原因包括“欧盟的崛起”、“欧洲的穆斯林化”；“中国的崛起”；“西方传统优势的丧失”；“西方地缘战略失误”，等等。第二，“他者”的崛起，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伊朗等。第三，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中心在扩大，外围在缩小，非西方大国正在进入到中心中来，与此同时，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区域之间、阶层之间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新的“再构建任务”。第四，一个可以“没有西方的世界”正在形成。亚洲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南方国家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程度上新的中心和外围关系，比如亚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已经超过了非洲和欧洲、美国之间的联系，迪拜成为亚非之间交流与合作最主要的枢纽。第五，由超级城市、全球产业链构成的超级版图世界正在重构地缘经济和政治的基础。按照斯特兰奇而是多年前的观察，西方体系在全球金融管理、环境保护和维护社会贫富、强弱之间的平衡方面已经失败了。

刘德斌指出，美国外交正面临新的现实：首先是美国的沮丧与愤怒，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接触派”设想的那样演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让美国遭遇了历史性的战略挫折。第二，美国力图“改弦更张”，改变与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形成的分工体系和依存关系，并在高科技领域“孤立”中国，但中美经贸关系能够“脱钩”到何种程度还不好说。第三，



---

中美关系“逆转”，但中国与美国西方盟国之间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依然存在。这些国家在对华关系上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第四，特朗普的“倒行逆施”已经几乎已经使美国在世界上的“道德优势”丧失殆尽，拜登政府正在竭力修补，但美国已经难以自诩为民主国家的“典范”，已经难以在世界上像以前那样“发号施令”了。第五，关于美国与西方联盟的命运。刘德斌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联盟是1945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冷战结束之后已经摇摇欲坠，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过程。现在西方急需新的共同“威胁”而重新凝聚起来，中国的崛起似乎为西方提供了一个选择。第六，美国社会过去四十年里不断加深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中产阶级规模的萎缩，使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再构建”成为当务之急，美国的对外政策将不得不以此为出发点。最后，中美博弈目标是什么？就为了世界争夺第一？美国能够接受世界“第二”的身份吗？刘德斌认为，问题不会那么简单，但不管我们如何称谓新时期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走向全方位竞争似乎已成历史必然趋势，竞争的范围和深度可能远远超过美苏“冷战”。国际关系格局在中美竞争中的走向两极化、多极化、单极化还是区域化还不好说。但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在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之后，中国还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刘德斌借用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建言结束了他的发言：世界所需要的是经济上充满活力，社会具有吸引力，强大且负责任，具有战略意识，在国际上受尊重，以及在与新的东方保持全球接触方面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美国。刘德斌认为这是任何一个世界大国都应该做到的。他强

---

调，中美竞争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以中美新的竞争关系为标志，中国的崛起进入了新的时期。

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上述发言内容进行对话与交流。

**邢悦：**从国际关系理论来讲，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逻辑起点和世界观完全不一样，是泾渭分明、不可通约的。现实主义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不可调和，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势之争，世界不可能出现永久和平。理想主义也承认世界是无政府的，但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调和，可以通过国际法、自由贸易、国际合作、民主制度等实现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但今天咱们这个会议讨论这两个主义的时候显然与国际关系理论是不一样的，我的理解，理想主义是要讨论美国对外政策当中价值观、道义和意识形态的考量，现实主义是说美国对外政策当中它的经济、军事、战略、安全利益的考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怎么将这两种利益结合起来、协调起来。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既有现实主义的考量，又有理想主义的考量。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它的意义不是说美国既有现实主义，又有理想主义，而是要找出美国对外政策的不同之处，比如二者之间的比重，或者二者之间的关系。

**吴征宇：**理论和现实不要完全混在一起。在现实当中很难找到纯粹的现实主义者，或者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且这种区分也有问题。刚才邢悦老师讲的三大流派，是中国特色的创造。三大学派有共通性吗？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这些都是问题。

**于铁军：**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这些概念作为我们中国学

---

者的分析框架管用不管用？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东西能给你一套因果的解释，而你又不能发现更好因果解释的工具，现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关系，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

现在应该做的是将研究分析更细化一点。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这两个标签能把美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趋势分析清楚。比如说共和党里面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跟民主党里面政治光谱上靠中派的思想怎么能融合？这种融合会形成一种力量，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

**王立新：**会议本意是讨论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讨论的核心当然不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但是二者有密切的关系。国际关系中的理论对政策或多或少具有影响，或者他们的理论概括来自于美国外交的实践。我们在讨论美国外交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时要特别注意，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之下制定出来的，但是理论中的概念是没有语境的，它是学者提出的一个分析工具。

**牛可：**如何评估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周桂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高级官员和智库与高校之间是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例如，罗伯特·卡恩没有做过很高级的官员，但是却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对于美国智库及主流媒体的控制和影响无处不在。像米尔斯海默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只是局限于学术界或某个小圈子，但无论是新保守主义温和派还是自由主义温和派，在政府的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

---

**牛可：**能不能看出那些高度形式化、理论化的、像沃尔兹那样的理论对政策思想的影响？

**周桂银：**几乎没有影响，主要影响是实践派。但我们不能忽视实践派在高校学习期间受到的系统教育，恰恰是来自于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伊肯伯里这些人的思想和理论。斯劳特、理查德·福尔克长期在高校执教，培养了非常多的学生，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是显著的。

**王玮：**纯粹的理论是寻求对世界规律的一种解释，对人的思维会产生影响，政策则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所以二者不是一回事。理论家可以设想一套很完美的方案，但是可能无法考虑到各种客观实际的限制，在实际中的指导作用会减少。但如果用政策影响衡量一个理论家则低估了他的理论贡献，这种贡献可能要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人们才可以认识到。

**钱乘旦：**不管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现在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这些主义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于铁军：**美国现在是一个高度分裂的国家，但是在反华方面大家少有人地团结在一起了，说中国给他们凝聚了战略共识。现在在对华政策强硬方面形成了跨参众两院、跨党派、跨阶层的共识，这也是不太好的。

**邢悦：**国际关系中的三大主流理论目前在分析对中美关系时虽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但它们的逻辑是不同的。现实主义认为，从权力争夺的角度看，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争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进入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中，不接受自由民主的国际理念，因

---

此对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威胁。建构主义从观念的角度看，中美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接触和交流，在观念上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不仅如此，两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越来越尖锐对立。美国人认为中国主导下的世界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因而对中国崛起感觉到恐惧。所以虽尽管三大理论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是美国的挑战，美国不能再等待了，但大多数美国人不认同现实主义的逻辑，他们比较愿意接受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逻辑。

**王立新：**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美国无疑仍受国际关系基本法则和逻辑的影响，即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是自助的，美国追求赤裸裸的现实的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还要看到美国的外交有一定特殊性，特殊不一定是例外，我把它概括为美国特殊的外交风格，或独特的处理国际关系的路径，这种独特风格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最典型的理想主义行动和政策主要是由美国实施的。

**谢韬：**我认为美国外交风格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外交决策的透明度，包括国会内部讨论，行政机构的讨论，国家战略发布比较透明，世界上很难有国家达到种高度。其次，外交决策的多元性，让人们看到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是不一样的。

**邢悦：**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有道义追求和利益追求，美国之特殊在于道义追求是它根子里的东西，现实利益则是在道义追求碰壁了不得已作出的妥协。原因在于，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宗教色彩最浓厚的国家，美国的奠基者是欧洲宗教改革后信仰最坚定的那批人。今天虽然美国宗教信仰多样化，

---

但是信仰上帝的人仍然占了 80%，这是我们认识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基础。

**王立新：**美国的独特性，第一是在于其理想主义目标或者手段不是在成为大国和强国之后发明的一套话语，不是仅仅作为治国术出现的，而是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经提出了理想主义的目标，像托马斯·潘恩说的要“重新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第二，美国的理想主义有深厚的国内基础，也就是说，它是基于国内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而且往往是公众推动美国政府追求理想主义的目标，所以有一定的可信性。此外，美国的理想主义有长期性和持久性，不是短暂的现象，条件不具备时会减弱或者消失，但条件有利时又会重复出现。

因此，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化地把美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行为一律斥为幌子和工具，而无视其深厚的国内基础和持久性，否则会发生误判，也不利于我们对美国的对华战略做出有效的应对。指出美国具有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决不是对它的赞扬，不是说理想主义就是好的，现实主义是坏的。事实上，理想主义在历史上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曾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灾难；现实主义也是如此。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仅仅是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不涉及对美国外交行为的道德判断，这是我们在使用这一对概念时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